

宗教文本的对话属性和翻译的主观性

阿姆鲁拉·海玛特 著 潘紫径 译*

摘 要：宗教文本的翻译者，谨小慎微、力求精确地在向另一种语言传达被信徒视为的神圣之言，以免改变其意义或意图。然而，对于诠释和翻译之本质的多学科研究却表明，这往往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通常，一个人对于自己所读到的内容的理解，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读者特定的情况有所变化的。每一个读者或翻译者都在与文本之间产生特别的对话，这对话是自发的，或者是根据读者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具有独特性的。因此，翻译者超越了传统语文学的界限，进入了诠释学的范畴，从诠释的客位视角转为主位视角。文本的对话属性已为巴赫金和伽达默尔等人指出。贝克尔的“动态语言”理论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对于翻译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当代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上，我们将探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本文将探讨宗教文本的对话性、启发性和转变性特征及这些特性对于此类文本的翻译有哪些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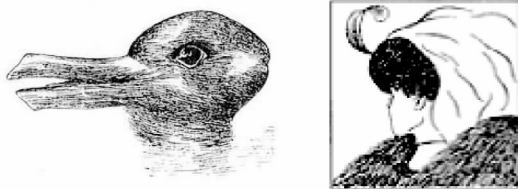
关键词：诠释学 文本 读者 对话 语境

* 阿姆鲁拉·海玛特（Amrollah Hemmat），北京大学西亚系巴哈伊翻译项目学术顾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行为科学理学硕士，南佛罗里达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神秘性、宗教性文本的翻译和诠释。译有四卷神秘主义诗歌集。目前致力于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诠释学。潘紫径，职业译者、编剧、导演、北京大学西亚系巴哈伊翻译项目学术顾问。

导 言

翻译是一种视野的融合。它是文本的世界观和译者的世界观的融合。文本和翻译者之间建起了一种对话，其中包含了译者创造性的、有意识的思考，译者个性与情感的参与，译者的文化与生活实践，译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译者使译文尽可能接近作者的原意，尽量把翻译的主观性降至最低。但是无论如何，所有这些追求客观性的努力都是基于译者对文本及其语境和作者意图的理解。所以，翻译虽常常被视为客观性的任务，却总是离不开译者的主观参与。

译者们对于所读到的东西，有着不同的理解力。不同的译者在同一文本中可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对于文本有着不同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视向盲”（aspect blindness）及鸭兔一体图和少女老妇一体图，都说明了两个人在看到同一影像时可能看到多么不一样的事物。他们看到的是同一影像，但所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事物。



这种视向盲现象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人阅读同一本文或听到同一讲述的时候。在宗教文本和神秘文本中，我们也会遭遇视向盲这一概念。宗教文本指出，有些人虽然读着经文，却不能理解经文。在圣经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说法：“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在著名的基督教神秘文本《未知之云》中，作者乞求读者不要跟未曾费数年时光做好灵性准备的人分享此书，“否则，此书对他毫无意义”：

借着爱所能承担的所有力量与威权，我命令你，我乞求你，不论你是谁，若你得到此书，也许你是它的所有者，也许你是它的保管

者，也许你是它的携带者，也许你是它的借阅者，你都不应该随意或故意向任何人读、写或提及此书，亦不应允许任何人读、写或提及此书，除非以你之判断，此人真确而彻底地决心全然追随基督。追随他，不仅在行动的生活中追随他，亦在静思的生活的极致中追随他，而这种静思的生活的极致是惟有必朽肉身中的完美灵魂凭上帝之恩典才能企及的。依你之鉴定，此人应是久已尽其所能，因行动而致静思的人。若非如此，此书于他毫无意义。(Wolters, 59)^①

显然，这段前言使读者问自己是否准备好了读这本书。读者自问：我是不是久已尽我所能做好了所有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反问句一样，这个“反问式警告”促使读者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以配得到这些文字。

这并不意味着，全然取决于过去的生活经验，一些人有能力与宗教文本发生认同，而其他人则不能。读者起步时若带着开放的心态，文本就似乎有能力逐渐改变读者，使文本对于读者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读者过去所做的尚不充分，他仍可争取达到完美。所以，《未知之云》在前言之后的开篇部分，紧接着敦促读者争取达到完美：“若你欲达到完美，现在你的整个生命都必须充满渴望”(Wolters, 60)。

因此，在读者和神圣文本之间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双向合作的关系。为了理解文本，读者需要接纳文本的意愿。而文本对于读者下一步所要做的事情，也要持续给予指引。在此意义上，宗教文本可被视为“一套规范图”，“要理解宗教信仰现在就变成了去欣赏它如何对忠信者的行动予以指示或教化”(Clack, 70)。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话语如何被理解，不仅仅取决于话语”(Clack, 82)。就此而言，神圣文本又是生发性的，因为它生发了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它引发了变化，而读者也参与了这一变化

① 在台湾基督教正教会网站上，这段文字被译作：“任何拥有这书的人，请知晓：我把一项爱所能承担的严谨职责委托给您。不管这书是您自己的，或是您替人保管的；不管是借来的或要转借给人，除非您确信自己或那人决意要在成全道上追随基督，否则不该读、写、讲论，或允许别人这样做。我心目中的读者是那已尽力完成积极生活，决意靠上主的恩宠，尽其所能，做一个深沉静观的人。凭您的明智，衡量他是否先有一段时间，忠信地满了积极灵修的要求，否则他绝对无法把握本书的内容。”在此引用此段文字，是为提醒读者此译文可有不同种诠释，而译者的翻译仅为其中一种。——译者注

的产生。文本具有生发的力量，而读者投身于态度的改善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这一生发过程。

文本借以帮助读者为阅读该文本做好准备的传播被称为“超传播”^①。这种超传播的另外一个例子见于《古兰经》。《古兰经》的第一章是一篇简短的祷文，而这篇祷文为读者的灵性体验做好了精神准备。《古兰经》第二章则描述了这本经书会帮助什么样的人：“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他们确信降示你的经典，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经典，并笃信后世。”^②这一章接下来描述了这本经书帮不了什么样的人：“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毕竟不信道。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按照这一说法，《古兰经》作为一本神圣经书，只引导那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人，余者读此经也不能受益。

对此有另外一种解读方法，那就是意欲从此书中得益的人，应该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打开自己的心和耳，除去遮住自己眼睛的东西。换句话说，这本经书要求读者在试图阅读此书之前，改变心境，以便领悟经文。

总体说来，宗教文本中常用“盲”或“聋”这样的词来形容对经文无动于衷的人：“他们是聋的，是哑的，是瞎的，故他们不了解”（Yusuf Ali, Koran, 2: 171）。在苏非神秘主义文本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警告，提醒不要与陌生人（aghyár，直译为“其他人”），即尚未准备好阅读此文的人，分享此书。在各类巴哈伊文本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理念。《真寻道者书简》（《笃信经》的一部分）也解释了意欲认识真理者需要达到哪些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包括行为方式，也包括各种美德，如谦虚、避免非议、谨守静思。

有鉴于此，神圣文本的译者需要思考这一重要问题：如果对文本的理解，确实与读者的灵性准备程度相关，那么对于我这个译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既然译者需要理解作者的意图，译者就不能采取所谓客观学者的

① meta-communication，常译作超传播，即关于传播的传播。有时也译作元传播、后设传播、后设沟通、超层次沟通等。——译者注

② 本文中所有涉及《古兰经》的汉译文本，均引用马坚的版本。——译者注

立场，因为他对文本的理解离不开他个人的判断、行为和生活实践。相反，译者的行为和思想影响着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因此，译者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灵性的智慧和见识。这就改变了对译者角色的传统看法。译者不仅要有能力恰当地遣词造句，还要有能力恰当地行为处事；不仅要遵守语法规则，还应具备伦理准则。同理，智与德必须相辅相成。仅有敏锐的头脑还不够，还需要有明悟的心灵。基于此，译者的灵性感悟力，其重要性即便不逊于翻译者的逻辑推理能力，也起码同等重要。

但是，译者的个人素养是动态变化的。译者的知识、情感和行为也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社会环境、个人意愿和决心及其他因素而改变的。因此，译者作为文本的读者和诠释者，就为文本的理解提供了动态的语境。这一语境基于译者与文本的互动，基于译者的生活实践、情感和态度而持续变化。不同的译者因各自的思想、情感和灵性境况的不同，既可在文本中识别出不同的意义，也可能生发出新的意义和诠释。

文本的动态特征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与前文提及的宗教文本和神秘文本翻译相关的一些理论。巴赫金把对话性文本定义为“召唤积极诠释的文本”，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定义的话，那么文本在这个方面的确可能具有对话性。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话性的，因为它邀请读者对文本中并存的多种相互冲突的声音和信息作出回应。读者积极地参与到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视角的对话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话性的。就其构成方式而言，它不是一个由单一意识主导、把其他意识作为客体纳入其中的整体，而是通过几种意识的互动而形成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意识沦为其他意识的客体；对于那些会根据某种常规的独白式叙述对整个事件予以客观化的观察者来说，这种互动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支持……这迫使观察者最终成为参与者……小说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对话性对抗变得难以逃避才搭建起来的。（Bakhtin, 18）

在这一段中我们看到，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并不是指多方会谈，而是“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单一叙述（宣讲、文本、故事等）是怎样提炼和激发相异文化、社会和语言环境里的语言，从而使这单一叙述可被诠释为多种声音和形式，并且相映成趣”（Duranti, 125）。

根据马拉尼昂（Maranhão）的说法，伽达默尔是促使我们关注文本的对话属性的先驱：

说者和写者身上难以清除的标记是演讲者，而听者和读者身上难以清除的标记是听讲者，有关说与写的这类比喻一直是传播理念的真正主宰者。伽达默尔率先打破这一观念的枷锁，提出对话就是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文本召唤着读者，对读者说话。（Maranhão, 245）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性的观察和伽达默尔的观点暗示出文学的、诗意的、神秘的文本也具有对话性。这类文本与读者的思想和文化相呼应，促使读者内在发生变化，并对读者的变化予以回应。读者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框架（即所谓的读者的语境）来诠释和理解文本的。这一理解促使读者的思维定势发生改变，生发出理解文本的新语境。这一新语境反过来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很像杜兰蒂从海瑞泰基（Heritage）那里继承来的社会对话的“双重语境属性”。在一个社会对话中，“后面的宣讲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被诠释的，这不仅依赖于先存的语境；这一宣讲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事件，它为之后的行动提供了新的语境”（Duranti, 29）。

就此而言，文学的、诗意的、神秘的文本并非把固定不变的信息，传达给处于固定不变语境中的读者，正如“管道式传播”的隐喻所暗示的那样。管道式传播隐喻寓示着固定的信息通过单向传播渠道（由文本至读者）送达所有读者，而在完美的传播中，所有读者都可对这些信息达到相同的理解，却完全不受读者主观性的影响。另外，同一读者从文本中总是能够得到相同的信息。

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同读者对于同一文本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

而同一读者对于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不总是一样的。对于同一读者来说，文学的、诗意的、宗教的文本大都需要不止一次地阅读。然而，尽管一个读者可能已经知道和记住了某个小说、诗歌或经书中的所有事实，一段时间过后他还是乐于重读。这是因为“读者的语境”（即读者理解和诠释文本的语境）在变化。根据读者每次阅读时的特定生活境遇、情感和情绪，读者对于一个小说或诗歌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一个意蕴丰富的小说或诗歌总是能够契合读者语境的这种变化。

文本的读者或译者往往选择对自己来说最合理的意义与诠释。基于自己对于文本的动态理解，他不仅选择，还对某些意义予以强调。此外，文学的、神秘的、宗教的文本还激发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新的意义，一种过去不曾存在的意义。这就超出了在多种可能的意义中做出倾向性选择或强调的界线，而产生了一种意义，一种过去或许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可能性。因此，读者是谁，读者在什么思想框架内阅读文本，都意味着选择或强调的意义和信息可能并不一样，并且同一文本中可能生发出不同的、创造性的新意义。

框 架 分 析

通过对语境这一概念的研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要考虑文本的语境，还要考虑读者的语境，即读者的思想和文化。这样我们可以把某些文本传播视为以“参与者为中心”的传播而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传播（Duranti, 125）。我们把读者视为传播过程的一个参与者。我们抛弃了传统语言学分析的视角，把读者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框架”纳入考虑之中。

基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社会环境“框架”理论，社会学家出身的古夫曼（Goffman）提出了“框架分析”理论。将其框架分析用于书写文本，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书写文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框架就是对一种现象的一种观察方式。就像我们透过窗户的边框看窗外的风景那样，照片的取景总是在边框之内强调一定的事物，消减或剔除其他事物。边框不同，照片或风景所传达的视角必然是不同的。就像我们在拍照片时要选择边框一样，我们总是对我们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有

意识或无意识的设定边框来取景。我们可以给我们观察的事物划定不同的边框，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所观察的事物必然产生不同的理解。

利兹—胡尔维茨（Leeds-Hurwitz）指出，古夫曼的著作《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描述了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多种框架如何同时运行：“此书提出的论点是几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往往成功地同时开展，而我们都有保持和改变原有框架的能力”（132）。例如：一个男医生在履行医疗专家的职责时，他同时也扮演着患者父亲的角色。医生接诊的这段时间内，这两种活动都在成功地开展。所以，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活动和交流可以是两种不同的框架，他们可以在这同一情境的两种不同框架之间来回转换。

社会交往中框架的转换决定了：在任一特定的时间点上，什么是主导活动，而什么又是其相关背景。随着情况的改变，相关背景也在改变；随着相关背景的改变，最突出人物（即中心人物）也在改变。例如，在我们的照片中，通过改变取景边框的大小和形状，我们可能突出画面中特定的某些人物，而使其他人物转化成背景或配角（即“景”）。与此类似的是，在公园里如果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交谈，而几个人围在一个人的周围，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这一情境下最重要的人物，而他所说的话是主导话语，即正在发生的主导活动。而这是会根据人群的空间位置的改变而改变的，因为人群的空间位置构成了语境或景。新的框架以不同的方式确定了“景”的边界，而“人物”也就有了不同的意味。框架的边界线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区分什么是“人物”，什么是“景”（Leeds-Hurwitz, 132）。

这些概念也适用于有对话特征的文本。我们可以说，待传达信息的相关背景取决于读者在特定时刻所具有的语境。根据这一语境，读者为文本的内涵设定了框架，而框架的变化则可能会推陈出新，感受到从前阅读时并未感受到的新意，即新的声音，或不同的信息。同理，适用于社会交往的那些理论也适用于神秘文本和宗教文本。这种对话性文本允许读者参与选择或强调某个特定的信息，而这种选择或强调自然是基于读者当时所处的特定情境、读者或译者框定文本内涵的方式。

案 例

宗教文本、灵性文本和神秘文本似乎格外能激发读者处境的改变。多

少个世纪以来，无论读者的环境、文化和思想如何变化，这些文本在激励、指引和领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读经者并不介意这些神圣文本中传达的信息一再重复，反倒可能日复一日地反复念同样的祷文，并对此产生强烈的需要，因为随着读经者思想状态的变化，同一经文会传达不同的意义。因此，读经者每次阅读都能从中得到不同的东西。

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人读经可能是为了寻求思想与情感的平和。他之所以反复诵读同一祷文或经文是因为祷文或经文能够使读者内在产生并强化一种语境，一种灵性思维定势；而无论日常生活环境多么变化无常，这都是读者欢迎或渴望保持的。这种灵性思维定势允许读者从文本中汲取更深厚的灵性营养。因此，前面提到的社会对话中的“双重语境”概念也适用于此。通过第一次阅读文本获得的思想框架将得到强化，并且形成一种促使读者反复阅读的思维定势。

象征性和隐喻性文本尤其具有强大的对话性。过去中国人遇到难题时，总是向《易经》寻求指引（当然到了现代这种情形大为减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接收到了对问题的解答。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易经》的文本通过占卜仪式得到一个具体的答复，而这个答复的诠释将在问题的独特框架内进行。过去，中国的王侯在做重大决定（比如战争）时，常常向《易经》寻求指引。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发现，他从古老的《易经》文本中获得的启发颇多，因为《易经》对于当下的世界作了象征性的表述。同样的实践在其他文化中也可看到。波斯人在遇到困境时，向哈菲兹（Hāfiz）的诗歌寻求指引。有些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遇到问题时，会带着具体的问题向神圣经文寻求答案。文本不变，但是读者却根据自己要问的具体问题，对于文本所说之事形成了不同的框架。

宗教文本和神秘文本中隐喻性的语言、故事、寓言和类比，与读者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两者共同创造了一种语境，并随读者文化的长久（甚至是永远）变化，而作出不同的反应——只要有读者读这些文字，这种变化就永远不会停止。在翻译中，译者需要考虑隐喻性语言的这种对话性、动态性特征。若原文的语言是模糊的、象征性的，且在无数语境下有多种诠释可能性，那么译者就需要避免传达一种固定的、清楚的、易懂的译文。

文本的悖论性

宗教文本并非全然是被动地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框定，在与读者的对话性关系中也发挥着主动作用。宗教文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运用了大量的悖论，以促成读者的观念和生活的改变。读者的变化过程是由文本的“有计划的不协调”（Burke, 1984: 91）、故意名不副实或故意自相矛盾造成的。有计划的不协调让人吃惊，使人反思，并激发思想的觉醒。文本中令人困惑的隐喻和不循常规的语言把读者推向一个超越的状态，即贝特森所说的“学习”状态，进而达到一种“关于学习的学习”的状态。读者批判性地审视过去所学习到的东西，审视自己是怎样学习到这些东西的，而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学习。文本令人困惑之处产生了“关于话语的话语”（即为什么对人来说，这个文本的意义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从而使人们对于话语，甚至对于世界，产生不同的理解。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1972: 271 - 278）的“双重束缚”理论适用于此。按照贝特森的特义，“双重束缚”是指一种情境，置身于这种情境之中的人面对着两个相反方向的障碍，在绝望之中产生一种摆脱这种局面的创造性新方法。将此理论用于分析神圣文本，迫使读者批判地审视常规的思想和语言，以及普遍存在的传统。

这是可以通过“有计划的不协调”来实现的。通过文本的语言，有计划的不协调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与此相关的常规语言和文化：“我们或许可以说，有计划的不协调应该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实验性地解开我们常见的形容词和名词、动词词组的分子组合。有计划的不协调应该把语言引入同样的‘分解’过程，就像化学家在炼油时所做的那样”（Burke, 1984: 119）。不协调可以通过内容和风格来产生。不仅是神圣文本中所提供的理念常常令人困惑，充满了冲突之处，文本的风格、语法表现、词语、字母、发音都可能令人困惑或震惊，或者看似毫无意义。但是，它们会促使读者反思，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宗教文本重新解读符号、转换隐喻、改变词汇。“这样的词汇不仅仅是词语，在这些词语背后有社会质感、民族心理、制度结构、目的与实

践”(Burke, 1984: 182)。因此,我们看到神秘主义语言和宗教语言常常违反常规,故意打破常规的语法规则。一些神秘主义者,比如鲁米(Rumi),强烈地抨击语法规则。有时候,新的术语和新的概念会取代旧的术语和旧的概念。通过故意错误命名,通过对已有事物予以重新命名或重新定义,就会出现有计划的不协调,而新的名字和术语取代了旧的名字和术语。比如,阿拉伯人把一个异教学者命名为“知识之父”,可是穆罕默德却称他为“无知之父”。

总之,神圣文本和神秘文本不时使用新鲜的、陌生的词汇,有时候还会改变常规词汇的意义,从而赋予已经存在的符号、象征和隐喻以新的意义;还有一些时候会发明新的词汇和术语来表达原来并不存在的新概念。神圣文本和神秘文本有时候通过自相矛盾和名不副实,通过违反语法规则并使用意义既不明显也不熟悉的词语或音节,来迫使读者思考,敦促读者审视旧常规和“旧神祇”(伯克的说法),并接纳新神祇。结果,对盛行文化与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就发生了,而读者获得了促进社会转变的动力和能力。

应该注意的是:神圣文本中的语言不可能全部是新鲜的、矛盾的、令人困惑的,否则它就没有办法激起读者的反应。“医治之方与疾病之因必有相似之处:一切有效的药物都是潜在的毒药”(Burke, 1984: 126)。因此,宗教文本运用普遍的、常规的词汇和术语来表达出不同寻常的新意。例如,读者观念的改变常常是通过运用隐喻来达到的。隐喻在熟悉的已知事物和陌生的未知事物之间搭建桥梁。通过隐喻,宗教文本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提供新的视角。隐喻引导读者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去实践人生。“我们的观点(即隐喻性延伸)正是通过隐喻来形成的——一个没有隐喻的世界是一个漫无目的的世界”(Burke, 1984: 194)。

动态语境

神秘文本、灵性文本和宗教文本是以一种动态的、复杂的方式与读者相互作用的。这类文本通过隐喻性语言和比喻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语境。比喻使读者生发出一种语境,以便使比喻听起来合情合理。对话性相互作用

的发生，有时候是伴随着读者行为和生活的改变，而这取决于读者的意愿和实践。

巴赫金认为对话性的作用是“激发诠释”（Duranti, 19）。一个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说，这个比喻毫无意义，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选择恰当的诠释方式，甚至从这个比喻中获得启迪，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意义。因此，人对于宗教经书和神秘文本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其反应可以从憎恶，到冷漠，到启迪，到觉醒，到对于信息的忠实奉行。在一个社会情境中，“人成为彼此的环境”（Duranti, 5），可以进行相互对话；同样读者也成为一种适宜的环境，允许文本传达其信息。意义是通过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产生的。在隐喻性文本传播中，读者成为文本的环境，并最终成为自己的环境，影响他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在社会相互作用中，“互动中每一个增加的动作都在修改着原有的语境”（Duranti, 5），并反过来影响未来的互动。同样，在与宗教文本和神秘文本的互动中，读者、信徒和忠信者与文本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关系，强化或弱化两者之间未来的关系。读者在前行，读者的生活实践改变着他与文本间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强化自己与文本的关系，甚至达到一种在外人看来奇怪而狂热的地步。另外，一个人也可能逐渐失去与文本的联系。就像音乐一样：你越多接触音乐，你越可能与音乐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强化的关系；或者相反，你对音乐了解得多了，反而可能会越来越不喜欢音乐。

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宗教文本和神圣文本为读者理解或创造文本的恰当意义提供了语境，并确定谁应该谁不应该读此文本。通过这个做法，宗教文本和神圣文本使读者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行为而为阅读文本做好准备。有时候宗教文本和神圣文本也确定出阅读文本的条件。例如，我们在巴哈伊文本中观察到，它既为阅读文本所需达到的聚精会神程度给出了指示，也警告读者不要在精神疲惫时阅读文本，以免给他们的灵魂增加负担。既强调不要无谓地重复阅读和背诵，同时也提出要按时阅读和背诵圣言。此外，我们还看到，对于阅读和背诵经文的环境之雅洁和态度之恭敬也都有所指示，并且对于阅读和背诵经文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有所规定。在这些指导原则之下，读者为阅读文本做好了准备。

读者的语境

在大寺庙和朝拜所里，都可观察到语境（根据个人环境而定）和神圣文本诵读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常规和文化遗产而建立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圣言的宣讲、圣文的诵读、个人吟诵或集体吟诵提供了语境。空间因素在寺庙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朝拜者需要长途跋涉，有时只能步行到遥远、高耸、难以到达之处，甚至可能需要在静思的状态里爬上很多台阶，经过很多道门，穿过花园、庭院。另外，自然环境也为朝拜提供了适宜的文化语境。麦加天房克尔白（*Ka'bah*）中不准猎杀的白鸽，泰国寺庙中不准侵扰的狗，花园的布局和植物的分布等，都提供了与其文化传统相宜的环境。

瀑布水流飞溅的声音、铃声、鼓声等作为环境声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便是静谧无声，也有其特殊作用。特殊的物理环境，如高塔、圆顶、塑像、艺术作品等都在帮助朝拜者做好情绪和态度上的准备。最后一点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成为彼此的环境”（Duranti: 5）。人群、人流、发型、吟唱、默诵，以及身体的姿势、动作，朝拜者的心理、情绪和态度等，都为朝拜创造出一种特定的语境，适宜朝拜者吟唱、诵读或默念长篇、短篇的圣文。

文本和社会

人成为彼此的环境可以有很多方式，而这影响着社会大多数对文本的拒绝或接受。社会的规范和态度常常影响个体读者的选择。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书写文本形成了一种负面的态度或正面的态度，而这会决定和影响读者个人与那个书写文本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文化语境就成为主导读者个人与文本之间可能如何互动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活动的大格局影响甚至决定参与者的言说性行为和非凡言说性行为。

然而，书写文本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社会大语境的影响。“社会大进程”可能受到文本的启迪，同时“社会大进程”也会对启迪自身的文本形

成自己的诠释。“社会大进程”在文本的激励下，可能按照文本的期望，去改变社会环境。神圣文本常常是通过使用比喻和隐喻性语言，搭起一座桥梁，连接读者已有的文化语境和文本可望生发的文化，连接人所熟知的既有文化和可望实现的未来文化，而未来文化的发展是通过读者的创造性参与来实现的。

就像面对面交流一样，没有任何交流是全新的。交流发生在语境之中，而语境又是可以被激发的，以实现促进改变的目的。比喻的基础是把已知领域中的某个事物与未知领域的某个事物联系起来，用熟悉的已知领域去探索未知领域内新的可能性，并塑造这个未知领域，而这反过来又将最终改变已知领域。

因此，比喻和隐喻性文本不仅运用、塑造读者的语境，还运用、塑造整个社会的语境，对于盛行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被理解、被体验、被感受的方式施加影响。这是语言和文化之间一种深层次的关系。改变盛行的语言，引入新的词汇，终将导致文化的变迁。语言不仅根据文化规范得到诠释和理解，还改变、塑造着文化规范。

对于诗歌、神秘主义文本和隐喻性文本来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文本能够激发和运用社会大语境，以利于自身的存在。对于文本的这一观念明显区别于对于语言和文本作用的传统观念。语言的客观性为“动态语言”（*linguaging*）的主观性所取代。文本理解与翻译中的传统语文学方法为当代语文学和诠释学所取代。读者、诠释者和译者的纯客观性为自反性所取代。自反性为读者和文本之间提供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可能，其目的是在文本的诠释中达到最大限度的客观，即尽最大可能接近作者的意图。

语言与动态语言

贝克尔强调语言（*language*）和“动态语言”（*linguaging*）之间的区别。语言用来指称编码形象，被喻为交流的管道。根据这一传播模式，说话者或写作者对于传播信息的编码是基于固定不变的原则，其传播是单向的，就像水流通过管道一样，流向听者或读者。然后信息被接收者解码，也是根据同样固定不变的编码规则。解码规则不根据解码者所处情境的不

同而有所改变。无论接收者的文化、传统如何，也无论读者的心理或行为状况如何，信息总是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解码和诠释。这是一种用于传播固定信息且信息可以基于固定的语境来得到诠释的传播模式。

动态语言则是“把塑造、存储、纠正和传播知识结合起来的一个开放过程”（Becker, 2000: 9）。传播不是在接收和解码信息之后就大功告成了。传播是“语境塑造”。它将影响信息如何被解码，而信息如何被解码也会反过来影响它。“动态语言既塑造语境，也被语境塑造”（Becker, 2000: 9）。

语言是建立在普遍的编码和解码规则上的，而动态语言则在个别层面上把旧的文本纳入新的语境。每一次社会对话，每一次与远距离文化的遭遇，每一次与文本的互动，都是一个传播中的双方，即说者与听者、人类学家与原住民、文本与读者，共同参与的独特活动。这种双方的共同参与在持续进行的、结局开放的基础上塑造了语境。

动态语言对于译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译者和诠释者来说，意识到传播的个别性和双向性是非常重要的。译者和诠释者要理解每一次遭遇都是个别的、独特的，在此基础上他们要做的不是依赖陈规老套和普遍臆断。相反，译者应该根据传播中所遭遇的个别情况，参与意义的创造。尽管人应该意识到文化和文化影响，但却不应该假定文化臆想是理解和诠释文本的固定语境。

诠释者的任务是基于对语境（既包括译出语的语境，也包括译入语的语境）进行反复的诠释性反思，解构自己的诠释。了解到这一点，译者或者人类学家就不会把自己视为信息的传递者，而是交流过程中的共同创造者。这使译者意识到，自己的翻译只是一种个别的诠释，而不是最终的诠释。伽达默尔（1975: 118）声称，“鉴于我们的历史性存在的局限性，所谓唯一的、正确的诠释的整个观念都显得荒谬”。

结果是不仅译者变得更谦虚、更开放，而且还产生了更好的译文。这个更好的结果是通过译者解构自己此前的译文才产生的。要承认诠释的主观性，但不应将其等同于主观主义或唯我论，而是应将其作为提供更客观

结果的途径。

贝克尔识别出两种语法：一种是传统的，有规则的，结构性的；另一种是塑造语境的，实用性的，关系性的（2000：189）。前者关系到语言，是普遍性的；后者关系到“动态语言”，是个别性的，是针对具体文本对话的。译者的任务是“尽量靠近那个特定语境中的文本，把它视为世界上的一种合理的、理性的存在”（Becker, 2000：73）。然而，这意味着“译者/诠释者的认识必须改变，从客位（外观）的——即外在者的视角——向主位（内观）的理解转变，达成一种更符合语境的理解”（Becker, 2000：72）。

贝克尔还把这一转变称为从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文学的转变。传统语文学关注的是词语、文本本身的构建、字典编写、编辑和初始翻译。现代语文学关注的则是语境问题（Becker, 2000：92）。前者的主要关注点是普遍性和语法规则，而后的关注点则是译者任务的特殊性。译者生活在当下，其工作是阐释文本或将文本与当下的语境联系起来。译者还需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揭示文本的语境。通过在当下揭示过去的语境，在过去呈现出当下的语境，古代文本的译者、诠释者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起桥梁。

如果我们用参与者为中心的模式来代替传播管道模式的话，人际（对话性）传播领域和文本性传播领域之间的传统学术分野就会变得模糊起来。我已阐明在对话性传播和文本性传播这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之中，传播中的某些语境元素起到的作用是极为相似的。当文本是隐喻性文本，而不是科学性文本或事实性文本时，这种相似性就会变得尤其明显。各种传统中的诗歌、灵性文本和神秘文本就属于那种与读者建立和保持动态性对话关系的书写文本。这种动态关系激发了读者的语境的变化，即读者的文化和思维状态的变化。

为了对这类文本进行恰当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文本与读者互动的动态属性，因为这会提醒译者避免把文本转换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译本，这种译本会降低文本与读者之间动态互动的可能性。另外，译者还要意识到，无论是作为文本读者还是作为文本翻译者，自己与文本之间有主观的、动态的关系。作为文本的诠释者，译者会通过内省意识到，“自己”在诠释一个文本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具有预先规定的、固定的

意义。约翰·杜威说：“意义是在一个有机体与其特定环境的种种相互关系中被观察到的”（Becker, 2000: 80）。特定环境或特定语境的概念是当代语文学家在先存文本以外提出来的概念。

结 论

人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发生在具体的语境中，因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客观科学主义对于翻译方法论的影响在于，它往往忽略了这种语境因素，因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同样的结论，无论作者的文化环境是什么，也无论读者的文化环境是什么。它假定真理应通过纯客观、纯理性的方式来获得，却回避了个人因素和文化因素。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被视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消极因素。

而诗意的、文学的、神秘的、宗教的文本则依赖文化语境、传统语境来有效地传达信息，甚至生发出新的意义。它们往往不是基于已得到证明的既有事实，而是基于模糊的旧有传统和文化语境，来生发出新的真理和新的文化语境。

社会科学家历来对社会情境中的对话语境研究有极大的兴趣，人类学者关注“他者”（其研究对象）的文化语境研究，而修辞学家们则对演讲或文本的语境有兴趣。在跨学科研究方法中，我们运用各种领域内的概念去理解相对于书写文本而言的语境概念。我们把这些概念用于读者理解神圣文本的语境。我们解释了读者的思维状态和文化如何为诠释提供了语境，以及这种语境为何是动态变化的。语境可以被文本塑造，也可以被读者的思维状态塑造，甚至还可以被读者的行为塑造。因此，文本和读者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动态的相互作用。

我们解释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如何形成一种影响其理解宗教文本的语境。我们看到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动态对话性关系如何影响新语境的形成，从而帮助读者达到更新的理解水平。我们探讨了基于已知文化和传统语境的隐喻性语言如何为新语境和新见解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我们看到了特定的宗教文本和神秘文本如何拥有生发性，而这种生发性能够使读者内在引发一种持久的、深刻的变化，并使其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

的文化语境，而这反过来又为加深和改变对文本的理解提供了基础。

根据这一观点，译者或读者起着积极而富于创造力的作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文本是需要被理解的‘生活的永远不变的表达’，而这意味着诠释性对话中的一方，即文本，只能通过诠释性对话中的另一方，即译者，来得到表达”（Weinsheimer, 349）。读者需要舍弃传统的、超然的外在观察者的“客位”视角，而采纳投入的、参与的“主位”视角。通过解构文本和自己所处的文化，投入的参与者试图对文本达到一种主位—客位融合的理解。译者渐渐意识到语言的普遍规则在读者特定的文化语境内发挥作用。文本并非对所有的读者都传达同样的信息。相反，文本的信息常常是由每一个特定的读者共同创造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参与诠释，而伯恩斯坦则如此解释诠释者的任务：“最具地方性的细节和最具全球性的结构之间的持续对话，并以此方式把两者同时彰显出来的过程”（Bernstein, 95）。在语言的普遍规则框架内，文本译者的主观作用取决于译者自身特定的文化和个人特征。认识到翻译这一主观性会导致更客观的译文，即更接近文本作者原意的译文。

至此，我们探讨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语境，二是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语境包含一系列复杂而相互联系的关系，既包括作者个人的传统和历史环境，也包括读者个人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作者的语境（即作者赋予文本的语境）尽管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却不是动态变化的，而读者和译者的环境却是动态变化的。然而，借助隐喻的语言，作者却为灵活地理解作者的语境和意愿提供了余地。两者共同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对话性关系，并反过来促使读者当下的环境和文化发生改变。宗教文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建立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宗教文本的译者只有充分意识到宗教文本的对话性、动态性和生发性，才能在译入语中创造出具有同样特征的文本。

参考文献

Becker, A. L. (2000). *Beyond Translation: Essays toward a Modern Philolog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cker, Alton. L. A Short Essay in Linguaging. ,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pp. 227 – 234.

Bernstein, R. (1983) .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urke, K. (1970) . *The Rhetoric of Religion; Studies in Log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ke, K. (1984) . *Permanence and Chan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ack, B. R. (1999) . *An Introduction 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U. 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uranti, A. & Goodwin, C. (Ed.) (1992) .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UK: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eeds-Hurwitz, W. (1989) .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Life: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aranhao, T. . Research Experience to Reflexive Method. In: *Reflection, Dialogue, and the Subject* (pp. 234 – 248) .

Morris P. (Ed.) (1984) .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Hodder Arnold Publication, London, UK.

Weinsheimer, J. C. & D. Marshal (Trans.) (1985) . *Gadamer's Hermeneutics ; a Reading of Truth and Meth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olters, C. (1978) . *The Cloud of Unknowing and Other Work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Yusuf Ali, A. (Trans.) (1987) . *The Qur'an: Text, Translation & Commentary* (English and Arabic Edition), Islamic Propagat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Sh. Muhammad Ashraf Publishers in Lahore, Pakistan.